

● 中国历史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 ——以戴表元为例

申 万 里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申万里(1965-), 男, 山东嘉祥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讲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元代社会史、教育史研究。

[摘 要] 宋元的更替, 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 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 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 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 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关键词] 江南儒士; 社会集团; 社会网络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402-06

儒士也称士大夫, 是两宋以来通过科举产生的一个新兴的社会集团, 两宋以来, 它完全取代了魏晋以来的门阀贵族, 成为主宰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元代江南儒士群体作为一个社会集团, 其内部成员之间以及与其他社会集团成员之间, 保持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存在, 在儒士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血缘、地域、婚姻、同僚、师生等关系构成的社会网络, 儒士在仕宦、文化学术等方面的成功与否,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营造的社会网络有关。

宋元的更替, 使江南儒士集团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蒙古统治者不信任他们, 限制其进入中央和地方决策阶层; 科举长期废止, 又使他们入仕无门。因此, 儒士集团在江南社会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其社会影响当然也大不如以前。但即使这样, 儒士仍然是元代江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社会集团, 是政治、文化精英, 儒士的言论和行动, 对江南各阶层有很大的影响, 儒士集团的政治取向是影响元朝江南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 探讨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 对研究元代社会发展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士的社会网络, 是儒士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 国外学者有人借助社会网络研究地方士绅(local elite)的地方统治问题^[1](P.1-20), 但目前有关元代江南儒士社会网络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由于没有太多前人成果作参考, 又缺乏有关儒士的详细史料, 使得这一研究特别困难, 所以本文的研究, 只是从社会交往出发, 进行初步的尝试, 儒士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还有待于以后的进一步探讨。

本文选取戴表元作为研究对象, 以说明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情况。戴表元, 字帅初, 一字曾伯, 庆元路奉化州人(今属浙江奉化)。宋咸淳年间进士, 任职建康府(今南京市)学教授。元军进攻南宋期间, 戴表元去职, 在奉化、杭州等地授徒为业近 30 年。大德六年(1302), 年近 60 的戴表元受荐为信州路

儒学教授,5年后归,至大三年(1310)死于家。戴表元一生坎坷,南宋时以科举闻于世,但仅做到建康府学教授南宋就灭亡,此后沦入社会下层30年,一直在失意和贫困中挣扎,晚年虽得一任,亦不过是位鄙俸薄的教官,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由宋至元的典型的江南儒士生活的缩影。在社会交往方面,戴表元在元初以东南文章大家名于一时,交游十分广泛,所以他的社会网络内容比较丰富,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说服力。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戴表元在元朝的社会网络情况,本文将戴表元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叙述。至元十二年(1275)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为第一阶段;元贞元年(1295)到大德六年(1302)为第二阶段;大德六年(1302)之后为第三阶段。这样分开叙述,能够反映出在不同时期戴表元营造其社会网络的不同情况。至于他在至元十二年(1275)以前的社会网络情况,属于宋代的范畴,本文不再涉及。

一

至元十二年(1275),元朝大军逼近建康,当时任建康府学教授的戴表元由建康避兵返回老家奉化,从此开始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社会网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初,他买屋与王子兼为邻,“两家生产赤立,徒有六经、诸史、先秦以来古文奇刻、处士之书合数百千卷,每闲暇时,流连聚论,日至五六往返,间为歌词韵语,以发其燕居之娱。”^[2](卷十一,王丞公避地编序)

与其游者还有袁桷、舒岳祥。袁桷在后来写的《戴先生墓志铭》中提到,戴表元自建康归奉化以后“遂俾桷事先生,始尽弃声律文字”^[3](卷二十八,戴先生墓志铭),说明这时袁桷已经拜表元为师。舒岳祥,字景薛,为宋宝祐四年(1256)进士,宋亡隐居不仕,居奉化之阆风里,称阆风先生。戴表元与袁桷师事之。舒岳祥在戴表元归来后写的《喜帅初归剡诗》中说:“吴客多留越,君寻古剡归,民贫官榷急,岁歉米船稀,……榆林知能隐,安得翅能飞。”^[4](卷三)表明了他对戴表元归来的又喜又忧的复杂心情。

家乡的安定生活不久就发生了变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至庆元(今浙江宁波),宋沿海制置使赵孟传降,元军旋扰奉化。戴表元与王子兼避兵天台县(元属台州路),天台县多山,元兵未至,许多文人雅士咸聚于此。戴表元与王子兼、舒岳祥、刘庄孙(字正仲、天台人、宋太学生)、胡元鲁(不详)等常以诗相唱酬。他在记述当时的情况时说:“每兵休事定,辄一会合,必有诗。”^[2](卷十八,题萧子西诗卷后)

至元十四年(1277)戴表元回奉化,次年在剡源(奉化)以南二里许的榆林,买地造屋,定居下来^[2](卷十六,小方门戴氏居葬记)。这一段时间,袁桷仍然“奉先子(即父亲)之命,以奉洒扫”^[3](卷四十三,祭戴先生)。舒岳祥此时居天台,戴表元通过书信与他以诗相唱酬。《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中有《寄天台舒阆风先生》诗,说明了这一点。至元十八年(1281),舒岳祥自天台归奉化,戴表元有诗以酬之^[2](卷三十九)。

至元二十一年(1284)戴表元馆于奉化袁氏授徒(袁氏指袁洪,字季源,袁桷之父)。当时同居于袁氏之馆的有舒岳祥、刘庄孙、胡三省(字梅涧、天台人)等。戴表元“与阆风、正仲和诗最富”^[5](卷十八,湖梅涧藏书窑记)。

这期间,戴表元结交赵孟頫。赵孟頫,元湖州人(今浙江省),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出身宋朝皇族,元世祖时,受程钜夫之荐至大都,任兵部郎中,延祐三年(1316)官翰林学士承旨,为元代才艺双全的知名文士。赵、戴二人“以诗文相振激”^[2](卷七,赵子昂诗文集序),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四《次韵帅初诗》写到“吴越相望三十年,相逢意气共翩翩,长歌白石徒为尔,远访丹砂亦偶然”。反映了二人交往的情况。

至元二十三年(1286)戴表元到杭州授徒。杭州为江浙行中书省治所,文人荟萃之地,因此,其社会交往面扩大了。当时在杭授徒者有:山阴县人徐天佑(字斯万)、王沂孙(字圣与)、台州人陈方(字申夫)、鄱阳人洪师中(字中行),皆与戴表元游。此年三月,周密(字公谨、吴兴人,仕宋,宋亡隐居杭州。)仿兰亭故事,招在杭名士燕集于杨氏临池之堂,受邀者十四人,因大雨,仅到八人^[2](卷十,杨氏池塘燕集诗序)。次年赵孟頫被元廷召致京师,戴表元写《赵子昂饮歌》,诗中有“从今做乐拌醉倒,与君相逢难草草”^[2](卷二

十八),反映了二人的友谊。此后二人常有书信往来。

在杭期间,戴表元还结识了下列人物:

鲜于枢。戴表元在《困学斋记》中写到:“丁亥(至元二十四年、1287)之春,余识鲜于(枢)伯几于杭。方是时,伯几以材选为三司吏掾,意气雄豪。”据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载:鲜于枢,字伯几,渔阳人,少为郡吏,后以材选为行御史台大夫掾。“每晨出,则载笔牍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欲弃去。……客至,则相对指说吟讽,或命殢径醉,醉极作放歌颠草,人争持去以为荣。”其外表“美须髯,望之甚伟。”戴表元对这样一位放荡豪迈的北方文士颇感新鲜,“真以为世外奇崛不凡人也”^[2](卷二,困学斋记)。

汤子文。戴表元《汤子文诗序》中有“辛卯(至元二十八,1291)孟春,忽邂逅于钱塘逆旅”^[2](卷九)。汤子文,丹阳人,事迹不详。

马德昌。戴表元《遗安堂记》云:“辛卯之春,余遇溧阳马德昌于松江之上。时浙西水,德昌以台僚衔命发粟赈济。”^[2](卷二)马德昌其人,可能戴表元对马氏的赈灾行为比较赞赏,二人相识,结为知己。

至元三十年(1293),戴表元由杭归鄞县,识奉化县尹丁济,他称丁济“知古诸侯之职,而无愧于诗人之所称”^[2](卷一,仁寿殿记)。他又代庆元路同知阮麟翁写了《仁寿殿记》,估计这时他与阮亦结识。这一年,戴表元被聘为奉化县学师,他在《七月初五夜养正堂示诸友诗》中写道:“儒堂得佳伴,吟讽动比邻。”^[2](卷二十九)反映了教授于奉化县学时的兴奋心情。

从至元十二年到至元三十一年间的20年间,是戴表元在元代生活的第一阶段。从以上有关戴表元社会交往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戴表元的社会网络逐步扩大。在奉化期间,由于这里位置相对偏僻,社会交往面很狭窄,所游者主要为南宋遗老、隐士,他们之间的交流内容也主要是怀念前朝的生活以及表示对现状的不满。来杭州以后,由于杭州是前宋故都,文人雅士、前朝遗老、新进官僚咸汇聚于此,戴表元的社会网络扩大了。除了前朝遗老、文学之士之外,增加了北方文士鲜于枢、江南行台台僚马德昌等,二人都在元政府中任职,这反映了他对元政权敌对态度的变化,也为他以后与元朝官吏的交往打下了思想基础。由杭归奉化后,戴表元即与奉化县尹丁济、庆元路同知阮麟翁结识,并受聘为县学师,反映了其社会网络的扩展。

二

元贞元年(1295)戴表元又到杭州。此后,除了在宁国路宣城县授徒一年左右的时间外(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戴先生墓志铭”有“先生授徒于宣”之句),直到大德六年(1306)任信州路儒学教授,他一直在杭州以授徒为业。这一时期他的社会网络迅速扩展并趋于成熟。与他交游的人物主要有:

梧谿法师。戴表元在《秋山记》中说:“元贞乙未(元贞元年,1295)之六月,法师与余相遇于钱塘西湖之上……越再月,余来宣(宣城县),乃始得登鳌峰而访秋山之居。”^[2](卷四)梧谿法师,僧人。

陈无逸。戴表元《陈无逸诗序》云:“戊戌岁(大德二年,1298)与无逸同客杭”,“于是与无逸游”,二人关系非常密切,“或携手秋郊行吟,或抵足夜榻卧讽,或杯觞探筹,或砚席点稿,欢谐怨对,舒适困促,一一共发之。”^[2](卷八)陈无逸当时也在杭州以授徒为业。

朱伊叟。戴表元《朱伊叟诗序》:“戊戌乙亥岁(大德二年——三年,1298——1299),余与乡友朱伊叟相遇于钱塘逆旅”^[2](卷九)。朱伊叟为戴表元同乡,事迹待考。

张仲实。戴表元大德二年(1298)重来杭州授徒,“(杭)州城之西南,余友人西秦张仲实居之……赖比邻于仲实而学之。”^[2](卷二“学古斋记”)张仲实,西秦人(今陕西一带?),戴表元好友,当时授徒于杭州。

赵孟頫。大德二年(1298)赵孟頫自大都南归,任江浙行省儒学提举,二人在杭州相会,戴表元作《赵子昂诗文集序》。大德五年(1298),赵孟頫在《宿轩记》中谈到二人在杭的亲密交往:“余于戴子遇于浙水之上,……于是握手而语,促膝而坐,莫逆而相与为友。其游从之乐,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为苦,商论辨析,百反而不以为异已。”^[6](卷七)这一年戴表元暂归奉化老家,赵孟頫写诗以送之。

方凤。字韶卿，婺州路浦江县人，宋亡后不仕元朝，为著名隐士。方凤是戴表元好友，大德二年（1298）他由婺州至杭“余与韶卿老矣，相顾尤不能为情，因相留止宿。无逸（陈无逸）大出酒炙饌具相饮，左觴右奕，前歌后笑，……略无道途羁旅之感”^[2]（卷十，客棧樓東冬夜會合詩序）。

方回。方回为徽州路歙县人，字万里，宋景定年间进士，知严州。元兵至，不战而降。授建德路总管，后罢官，往来杭、歙间。晚年寓居杭州，买文为生。戴表元《紫阳方使君文集序》中说“余戊戌（大德二年（1298））、己亥（大德三年 1299）间来钱塘，始得熟从紫阳方使君游”^[2]（卷十一）。方回的降元，在元初江南的儒士中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些人与之绝交，戴表元看来对这一点并不十分在意。

贡奎，字仲章，宣城人，其家为宋官宦世家。贡奎幼习儒，“名震江之南”。初被江浙行省任命为池州路齐山书院山长。大德六年（1302）中书省奏授贡奎为太常奉礼郎兼检讨，九年（1305）迁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至大元年（1308）转应奉翰林文字，阶将仕郎，预修成宗实录。延祐元年（1314）授江西行省儒学提举，五年（1318）迁翰林待制，至治元年（1321）致仕归家。泰定元年（1324）复起为翰林待制，天历二年（1329）以疾归^[7]（卷十一，集贤直学士贡文靖公神道碑）。戴表元有《送贡仲章序》一文，说明二人曾有交往。

子仪和尚，浙江僧人。戴表元《送子仪上人北游序》中说：“余穷居二纪以来，多喜与山林世外若为浮屠氏之学者，相往还以为乐，庚子之春（大德四年，1300）有越僧（子）仪者访余钱塘吴山授徒之舍。”^[2]（卷十四）

白廷，字廷玉，钱塘人，原姓舒，为宋宰相舒璘之裔。宋亡，不仕，浪迹山水间，宣慰使鲜于枢买屋使之居。此后，受荐为太平路儒学正，大德四年（1300）升常州路儒学教授，再迁庆元路儒学教授，未上，翰林、集贤两院共荐之为江浙行省儒学提举司副提举。任满后迁婺州路兰溪州判官，不赴。从此绝仕进意，隐居杭州西湖。天历元年（1328）卒^[8]（卷十九，元故湛渊先生白公墓志铭）。戴表元与白廷为同乡好友，他有《送白廷玉常州教授序》一文^[3]（卷十三），可证二人的交往。

柳贯，字道传，婺州路浦江县人，其家为宋官宦之家。柳贯初被荐举为江山学教谕，又为昌国州学正。秩满，至京师，擢将仕佐郎国子助教，后由助教升博士，迁太常博士，授江西行省儒学提举。至正初起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留主乡试后，即赴京任职。至正二年（1342）卒于京师寓所^[9]（卷十，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戴表元与柳贯的交往在黄潛《元故翰林待制柳公墓表》中有记述：“杭于宋为故都，向之宿儒遗老独有存者，（柳贯）公遍游其门，无不折行辈与为忘年交。而与……戴先生表元……往来咨叩无虚日。”^[9]（附录）

胡士谦。安阳人，以儒入官，在江浙行中书省任职，曾推荐戴表元为信州路儒学教授^[2]（卷十五，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

此外，这一时期，与戴表元游的还有屠存博（婺州路学教授）、盛元仁（吉水州教授）、李元凯（不详）、王润之（不详）、戴锡（字祖禹）、顾文琛（字伯玉）、林以道（不详）等。

从这一阶段戴表元对其社会网络的构建可以看出：元贞以后，随着舒岳祥、王应麟等宋遗老的亡故，戴表元的社会网络急剧扩大。除了前朝遗老、同乡之外，戴表元的社会网络中增加了方外人士（浮屠氏），以及入元以后仕元的成功之士，如柳贯、白廷、贡奎、方回等。特别是与后者的交游，占了其社会网络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得益于杭州优越的人文环境。同时也说明他这时虽身为隐士，但对“仕元”并不是强烈反对，他的这种心态，为他不久入仕教官创造了条件。

三

这一时期，属于戴表元的晚年，共9年。其中，担任信州路儒学教授5年，归家闲居4年，元至大三年（1310）戴表元卒于奉化家中。

大德六年（1302）戴表元接受荐举，出任信州路儒学教授。他在《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中说：“大德壬寅（大德六年，1302）岁，余来钱塘授徒且五年，识安阳胡士谦于中书行署，恂恂然儒也。于是诸公怜余

老而加穷,荐授之一官。将行,别士谦。”^[2](卷十五,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从这里可以看出,戴表元被荐为教官,其友胡士谦之功为大。此后,戴表元的交游对象主要有:

赵某。信州路稼轩书院山长。戴表元大德七年(1303)写《稼轩书院兴造记》,文中有“余尝以暇过赵君”^[2](卷一)。这样看来,戴表元在信州期间,与当地的儒士、教官等有一些交往。

袁易。字通父,长州县人,隐居力学,袁易与戴表元有亲戚关系。戴表元《题袁通父词卷》有“羨通父之襟谊,能文而好礼”之句。^[2](卷十八)

卫君用。此人情况不详,戴表元《洛阳独乐书堂记》中记载:“大德丙午岁(大德十年,1306)余遇卫君用于信州幕府。”^[2](卷一)

这段时间,戴表元所交游之人见于其文集记载的大致仅此3人而已,这说明戴表元晚年的社会网络急剧缩小,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大概有下面几点。

第一,平时好友很多已经故去,如鲜于枢(大德六年)、谢翱(元贞元年)、刘庄孙(大德六年)、周密(至大元年)、任士林(至大二)等,即使没有故去的也已年老,对生活失去了往日的热情。

第二,戴表元远在信州,人事生疏,与往日旧友已经失去联络。

第三,戴表元晚年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感到“筋骸倦衰,世念益薄,而眼前子息各以长大,平生婚嫁,渐就轻简”,因此已经没有生活压力。回乡后,他又以“余资三千缗”,建房一百三十六楹,奔波一生,晚年得安,“何不可乐”^[2](卷二,质野堂记)。另一方面,作为宋进士,入元隐居大半生,到老又仕元朝而“失节”。这对他来说非常遗憾,是他心中的一个伤口。因此,对入仕的悔恨又使他感到非常失落。他甚至悔恨自己读书为儒,羡慕一般农民的生活。他在《丙午二月十五日以府檄出宿了岩》诗中写道:

“衰年慕栖息,役役殊未休,天明发东廊,日晏泊西州。岂其千金躯,为此一食谋?宿麦清已郁,稚桑黄亦稠。欣然一会意,所愧非吾丘。悔日谅不远,誓言良未酬。挥手谢还往,伊忧自伊忧。”^[2](卷二)

他在《送官归作》一诗中又写道:

“生世悔识字,祝身如野农。勤劳养尊老,膳味日可重。晨锄熟新黍,耕林有过从。行吟岑松籁,此乐逾歌钟。”^[2](卷二十七)

第一首诗反映了戴表元对自己一生失望的心情,第二首则反映了他对一生为儒的悔恨。既然已经“挥手谢还往”,“生世悔识字”,那么,自然就不会在意去经营自己的社会网络了,这确实是元代大多数江南儒士的悲哀。

四

综观戴表元一生交往情况,可以把他的社会网络分成下面几个层次:第一,他与前朝遗老、隐士的互动关系而形成的网络。通过这一网络,戴表元一方面向他们学习或切磋诗文词章,另一方面通过与他们的唱酬,发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以缓解穷困不利的环境带来的精神压力。第二,与元政府官吏互动形成的网络。作为一名前朝进士,戴表元最初是不愿意结交元朝官吏的。但北方儒人的气质(鲜于枢)使他感到耳目一新,更主要的是,他一生穷困,结交权贵,可能给他带来物质生活方面的好处。他结交的丁济、阮麟翁等官吏,不能不说有这方面的考虑。第三,仕元的成功之士。元初江南儒人很多仕元,一些人还取得了成功,如赵孟頫、邓文原、白珣、倪渊、方回等,通过与这类儒士建立社会网络,不仅可以在诗文上切磋技艺,还可以得到他们的推荐而获得入仕的机会,以改变其穷困潦倒的状况。第四,同事或同僚。戴表元在杭州授徒期间,同许多同在杭州授徒之儒士关系密切,如陈无逸、顾伯玉、林以道等,在信州任儒学教授期间,与信州的一些教官也有联系。同此类儒士建立社会网络,可以减轻平时的孤独感,更加重要的还是能在授徒或做教官时,得到同僚的提携和照顾。第五,浮屠氏。浮屠乃方外人士,与此种人士建立网络,虽不能带来现实方面的利益,但元代江南地区的方外之士,很多是儒士出身,有很高

的文学修养。戴表元中年以后,生活贫困,情绪也比较消沉,估计他与这些浮屠之士有共同语言,还可以以诗文相唱和,“相往还以为乐”。综观这五个层次的社会网络,戴表元一生中与之产生互动关系的,主要还是江南儒士阶层,儒士以外之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总的来看,戴表元的社会网络还是比较单一、狭窄的,这反映了元代江南儒士集团的封闭性。

[参 考 文 献]

- [1] ESHERICK, Joseph · W & RRANKIN, Mary. ads. Chinese local Elite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2] 戴表元. 剡源戴先生文集[A]. 四部丛刊初编本[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3] 袁 桢. 清容居士集[A]. 四部丛刊初编本[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4] 舒岳祥. 阆风集[A].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 [5] 全祖望. 鲒埼亭集外编[A]. 四部丛刊初编本[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6] 赵孟頫. 松雪斋文集[A]. 四部丛刊初编本[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 [7] 马祖常. 石田文集[A].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3.
- [8] 宋 濂. 宋学士全集[M]. 丛书集成初编据金华丛书排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 [9] 黄 潜. 黄文献公集[M]. 丛书集成初编据金华丛书排印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责任编辑 吴友法 途文迁)

Social Network of the South Confucian Scholars in Yuan Dynasty (DAI Biao-Yuan as example)

SHEN Wan-li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SHEN Wan-li (1965-), male, Lectur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social history and education history of Yuan dynasty.

Abstract: When Yuan government was in place of Song government, the southern Confucian scholars who had occupied the governance position in Song government were impacted badly at the environment of Mongolia ruling. Their life style, their idea took placed very big variety. An obvious characteristic was that they made a point of establishing the social network to support their benefits and their living condition more than ever. DAI Biao-yuan was the best typical case of them.

Key words: the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South; the social group; the social network